

## 川陕甘灾后感想

电视机一遍一遍地放映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“夺金”的景象，收音机从早到晚回荡着播音员欣喜的声音，报纸一律套红，各种奖牌获得者的故事几乎要溢出版面……就在这“举国欢庆”的时候，我看到某报的一则消息：据权威的委员会估计，“四川地震”灾区的重建需要“一万亿元”。消息后面跟了两行文字：“截至8月12日为止，四川地震造成死亡69225人，受伤374643人，失踪17923人。”整段消息都缩在报纸国内新闻版的右下角，标题的字体细细的，最后那两行连标题也没有，只以一条横线与消息隔开，仿佛存心不让人看见。

我忽然意识到，川陕甘地震，已经过去三个月了。

### 1

“失踪17923人”，单这一句，足以让你意识到灾情的惨重，三个月过去了，依然有那么多尸体埋在废墟里，没有挖出来！

可以从多方面解释这份惨重。本来就是巨大的天灾嘛：八级强震，从川北一路震到甘南；余震接连不断，好几次都超过了五级；震中地区山峦密布，地形复杂，援救起来非常困难……

但有一个方面不能不说：历年积累的各种社会弊病，也明显加重了灾情。这次灾区的死伤者，既是死伤于地震，也是死伤于毫无防备，死伤于“豆腐渣工程”，死伤于长期的贫穷，死伤于通讯、交通、医疗设施的不足，死伤于从日常管理到紧急救援的各种体制的僵硬和脆弱……

这不奇怪。现代社会，纯然受害于天灾的事情是很少的，绝大多数天灾，都有人祸掺杂其中。这些人祸并非只在天灾爆发时才显

形，也绝非只作祟于爆发天灾的地方，但因其持续、分散，后果缓慢，更因受害者尚有他途可避，它们往往不会引起剧烈的反应。

但是，天灾却以震撼的方式，将这些人祸集中暴露，令人无法如平日那样漠然置之。“豆腐渣工程”遍布国中，上上下下说了多少年，好像都没有什么用。可这一次，成千上万的学生被那些偷工减料的校舍活埋了，谁还能继续木着张脸、不为所动？当要求被害学生的家长停止游行的时候，灾区的那位书记只能下跪了，惨烈的灾情已经将人祸暴露得那么触目，再铁石心肠的官员，怕也难如往日那样一脸威严吧。

这可能就是天灾最大的社会意义之所在了。人类现在还不能根除天灾，甚至也很难减少天灾，但一个有出息的民族，却能因天灾而反躬自省：一，管住自己，不要为了愚蠢和贪婪引发天灾；二，尽量将房子造得结实一点，让社会公平一点、民主一点、穷人更自主一点，人祸因此能少一点，社会抗灾的能力也大一点……天威固然每每难测，人生却不一定因此无常，如果能将遭受天灾的惨痛，转化为革除社会积弊的意志，不但抵抗天灾，更奋起打击那些助灾为虐的人祸，那么，当下一次天灾突降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应付得比这一次好。

川陕甘地震似乎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可能。它刺激民众重新睁大警惕人祸的眼睛，也令许多人祸的制造者气短神靡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，自觉不自觉地收敛和退缩。当灾民群起围攻那些利用职权、私取救灾物资的不良官商的时候，当抗议者面对警察，忿激地说：“这个时候还这么搞，太不像话！”的时候，当举国上下强烈要求监督捐款流向的时候，甚至当贵州某地民怨爆发、网上议论滔滔、中央领导直接介入、肇事官员即遭革职的时候，你都能清楚地感觉

到，惨烈的灾难已经打破了萎靡消沉的社会气氛，并且在这个意义上，开始改变现实的力量对比。

当然，我也看到另一种相反的可能。三个月来，一些主流媒体始终只讲天灾、讳言人祸。就连那些活埋学生的校舍，都有负责部门的官员站出来，公然否认其建筑质量有问题。不要觉得这很荒唐，1950年代末的那一场大饥饿，不就一直被冠名曰“自然灾害”，并且以社论、历史著作、教科书等等方式，让广大非亲历者相信了么？就是今天，也还有许多年轻人对那饿死者的天文数字半信半疑：“有这种事？夸大了吧？”

正因为过去许多助灾为虐的人祸未能被及时揭露，甚至反被成功地隐瞒，今天的各种天灾，包括川陕甘地震，才得到这么多人祸的推助而恶威大增。倘若这一次还是如此，几年之后，人们除了天威莫测、举国同哀，对这一场灾难就没有别的印象了，那么，灾区的十多万死者、数十万伤残者和更多的无家可归者，真可以说是白死、白伤、白受难了。

一定要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！

## 2

真能打破么？

今日中国，政府独大，能不能打破那个恶性循环，先得看它。

这一次救灾，中央政府表现不俗，反应之快，调动其行政、军事和象征资源之有力，都是1949年建国以来没有过的。

大凡集权程度比较高的政府，一遇到紧急情况，都会本能地加强控制，最好把什么都捏在手里。但这一次，中央政府明显克制了这种本能：允许大批志愿者进入灾区，允许若干境外的救援队参与搜救，还允许“牛博网”这样的非官方募捐渠道继续运行……这更是

1949 年以来没有见过的。

“党和政府”的“喉舌”，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电视媒体，这一次也表现不凡：24 小时滚动播出；逐日公告死伤数据；震后第二天就宣布：死亡人数将在 5 万以上——其时能核实的死亡人数还不到 2 万，紧接着更直播民政部对中外记者的报告：已经向灾区运去了 7 万条尸袋……要到多年以后，人民才知道唐山地震死了 24 万人，而非当时政府公布的 10 万人，两相对照，这一次官方媒体对大规模民事灾情的实报程度，也是 1949 年以来没有见过的吧。

从道理上讲，政府救灾，是应该的，这是它必须履行的公共责任，没什么可夸耀的，人民更不必惊喜和感激。如果太多这样的夸耀、惊喜和感激，那只能说明，我们的——不仅仅是对本国的——记忆太黑暗了。

但是，光用“理当如何”这一把尺，并不足以测量现实的世界。人民之所以对中央政府翘起大拇指，心情其实相当复杂。有切身的感激，一位灾区小镇的下岗女工就明确对我说：“这一次要不是解放军，老百姓就苦了！”也有不自觉的无奈：升斗小民，无物可恃，不靠政府，靠谁？有追昔抚今的感慨：不管过去怎么样，这一回终究进步了嘛。更有着眼于将来的期盼：请往这个方向努力吧！恰似智慧的老母，鼓励和引导儿郎继续走正道……

“政府”并非两个字，也不是一块板。它当然有强大的逐利本能，但“利益”却是多种多样：地区、部门的利益，还是政府总体的利益？近在眼前的诱惑，还是将来的长远的效应？它的头脑也不单一：机关里长久养成的惯性，决策者个人的品质，赤裸裸的功利权衡，不只是一时冲动的道德自许……一旦权衡利益，这些都会跑出来打架。它更受缚于各种历史和现实条件：从解放军露宿街头、不扰

上海市民的照片，到“准备死两亿五千万人，打第三次世界大战”的狂言，从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和“四·五天安门事件”，到“以人为本”和“为人民服务”.....都是它的施政传统的一部分；今年初春的大雪，奥运会的火炬，拉萨骚乱，“东突”爆炸，二十年财富总量的急剧增长和分配不公，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缓慢激化，“与世界接轨”的既定国策，缅甸军政府拒绝外援的恶劣影响.....国内外各种现实情况，也都在它这次的救灾行动中显出了影响。

倘说，它过去就不是只有一个意志，也并不都能一意孤行，那现在，它就更不是这样了。

看一个具体的例子：它这一次如何管制舆论。地震一来，宣传部门习惯性地收紧缰绳，电话指令一个接一个往下发。但是，大批记者蜂拥入川，其中许多人是自发前往，惨烈的灾情通过他们发回的图像和文字，迅猛震撼了各类媒体的编辑和播放室，由此激发的报道冲动，显然不是那些电话能够完全约束的。时值奥运会前夕，境外记者早已云集国内；互联网时代了，灾区内外的热心网民，谁都能够用手机和电脑上传真真假假的见闻：在这情形之下，也不会有谁还想全面封锁信息，自陷被动吧？“收”“放”结合，“放”中求“收”，差不多成了唯一的可行之策。

正是这多种因素的合力，成就了一套管制信息、引导舆论的新做法：放松对民事灾况报道的限制，但要求侧重天灾，避谈人祸；允许介绍民间的救助，更要求突出宣传政府.....也正是这套新做法，形就了一个凸显民事灾情的新空间，它足以容纳传媒人员最初的大部分情感反应，短短一两天里，一个以“24 小时直播”、“如实报道民事灾况”、“高强度渲染悲情”和“突出政府领导人亲民形象”为主要特征的新的传播模式，就在其中迅速形成，并在最初的一周里，引获

观众的广泛共鸣。

惟其一定程度地放了，让“震惊”、“悲情”和“爱心”有了宣泄的渠道，其后的逐步收紧，才能一路顺行。总体来看，这一次政府对舆论的管制相当成功，主要电视台、报刊和门户网站的信息发布基本一致，言论上的差异空间也很窄小。

但惟其放得有限，夺人眼目的新的报道空间，又很快暴露出边界太清晰、幅度有限的弱点，整个传媒的运作，随之显现疲态。十余年畸形“市场化”养成的传媒习性：过分依赖电脑技术、为争夺眼球不顾其余、多数业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思考能力……更放大了主流媒体在这逼仄空间里成败相随的窘境：它们的确显示了煽引民情、聚集人心的巨大能量，但它们同样显示了，如果没有其他补充——例如多样的公共信息和深度分析，这种能量会很快耗尽。公众因此四散的信息需求，犹如顺流直泻的河水，会随时在遭遇阻碍的地方，酿成新的紧张。瓮安民变之后的网上反应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

中国的“政府”，真是比其他地方的“大”很多。要是政府垮了，宪法、国旗、政治和经济制度，乃至疆域，都势必随之改变：政府和国家，事实上已经混为一体。最近半个多世纪，先是“社会主义”，接着是“中国特色”的“市场经济”，将社会原有的各种经络扫荡一空，政府也就成了唯一的整合系统，你看这次灾区，哪里政府散了，哪里就会大乱：这个已经和国家混为一体的政府，差不多又和社会混为一体了。

正是这个“大”，给了政府动员和管制中国的巨大力量，但也是这个“大”，让它常常不大像一个整一的运转灵敏的有机体，零件四散，各转各的；甚至不大像一个稳定的轮廓清晰的固体物，体制内

外、乃至中国内外的许多界限，日益模糊。

因此，从“政府”这个角度，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图景：庞大的行政和体制性力量，在深广的社会巨变中扑腾起伏。它常常固执己意，有时也不得不顺从时势。当积习发作的时候，它好像要拉着社会退回过去，实际上却不可能，总有一些打开的门窗锁不回去，一些新的空间抹不掉了。它现在内蓄多种势能，其中几乎每一种，都与体制——乃至国境——外的同类互相呼应，这些势能之间的聚合冲突，就势必越搅越大。虽然看上去波浪不高，大多还只在水面下暗涌，其漩涡却日渐深广，已经将整个社会，甚至很大一部分世界，都卷入了其中。这些势能当中，有一股特别气势汹汹，它左手弄权，右手拢钱，一心将中国推入“权贵资本主义”的轨道，以便独吞经济增长的成果。但它越是接近目标，社会越颠簸得厉害，其他势能的反弹，也就随之而起。这些反弹并不能完全挡住它，但却足以震响警报器，让更多的人意识到，社会的倾斜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，那庞大的行政和体制性力量，也不再仅仅显形为我们熟悉的那个“政府”了。

这就是说，即便在最为狭窄的意义上，“政治”一直在变化之中。在这片领域里，过去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政府，围起栅栏、划定方圆，居高临下、监管一切；现在不同了，栅栏毁了一大半，地上的划线横七竖八，监管者依然攥着最多的工具和资源，其面目和身形却日渐模糊，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，这地界上好像没有“监管”了，什么势力都可以进来捞一把……目睹这样的现实，一个对政治抱有理想的人，多半很泄气吧？但如果仔细分析，你多半又会觉得，事情并不是那么无望。这一次灾情对上下各界的冲击，就给了我们许多对政治的正面感受，尽管我们都明白，一旦情况变化，别样的

感受一定袭来。因此，当我说“先得要看政府”的时候，不是说大家只能仰头等待，看它给我们多大信心，而是说要从“政府”这一扇窗口，去了解行政和体制性力量的变化，看清其活动领域的新的状况。这领域现在扩展了许多，边界也不再如昔日那么封闭，这一次的救灾更确实显示了，不但恶性的因素纷纷介入，良性的因素也能够介入，并且发挥相当的影响。当意识到政治变化所蕴含的种种不良趋向的时候，也要充分看到，良性的趋向同样存在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愿意说，打破那个恶性循环是可能的，我们应该进一步努力。

### 3

这一次最给人信心的，还是民众。民间捐款和捐血之快、数额之高，均为近年所无；大批远地的志愿者——主要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中等收入阶层，也有其他地区的工人和农民——入川救灾，更是前所未有的。比起官员、资本家和其他公众人物，普通民众的救灾热忱本色得多，也积极得多。

这热忱的背后，是某种模糊的共命运感。虽然还是内外有别，对川陕甘灾民的巨大同情，并没有扩展到缅甸灾民的头上，你甚至可以预料，今后对于邻国的灾难，大多数中国人依然会很冷淡，但是，确有越来越多的人，表现出了对一己之私的超越。“别的都让开，救人要紧！”“人人都会遭难，这时候就别分你我啦！”“太惨了！我得做点什么！”“平安就好，今后要珍惜生活啊！”……三个月来，这些遍布灾区内外的言行，无论其为积极还是消极，都让你强烈地感觉到，灾难时刻的人民，真是打开了心胸，和平时大不一样。

不必把这热忱归因于某段历史时期，无论“毛泽东时代”，还是“改革开放”。它当然从这些时期得到滋养，1950年代形成的“一方有



难，八方支援”的传统，1980年代的“人道主义”思潮，都在它这一次的爆发中闪耀光彩；但它也在这些时期遭受损害，“文革”造成的至少两代人对“人心”的疑惧，1989年以后民众公共意识的普遍消退，至今还很深刻。我觉得，这一次人民的热忱其实有更长远的历史根源。至少晚清以来，每当中国发生大难，民众都会表现出巨大的救援热忱和共命运感，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，都不会忘记那些可歌可泣的往事。

中国这么巨大，有这么悠久的文明历史，民间积蓄的这种爆发式的精神能量，是无论遭遇怎样的恶劣状况，都不会完全消灭的。即便一时遭受重创，只要有几十年的和平，一般社会状况不那么紧张，它就会逐渐恢复，重新滋长。“文革”结束至今，三十多年没有大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了，社会财富的总量快速增长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，也比过去有所提高，不说中上阶层，就是许多普通人家，也有了援助他人的经济能力，再加上这一次的视觉媒体，以空前规模和频率实报灾况、渲染悲情：在这种种情形之下，民众怎么会不奋起救援呢？

当然，再可观的能量，只要是因灾难而骤起的，多半随着灾难的平复而疾退，不能期望人民的“不一样”，在灾后还能长久延续，那些被压抑的精神陋习，难免卷土重来。

但是，这一次的情形似乎又不同。地震之前，拉萨骚乱和奥运火炬事件，已经强烈刺激了民众，地震再一来，民众——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白领青年和大学生——的情感爆发，就必然不止是针对腹地的灾难，也同时指向海外的压力。对受灾者的深切同情、对西方媒体的无知和傲慢的反感、对逆境中的弱者的感同身受和共命运感、要战胜所有压到我们头上的困难的强烈愿望……前几个月已经被

激起的爱国情绪，迅速聚化为对“中国”及其“一定会强大”的激情认同。5月19日全国哀悼日，数万人聚集于天安门广场，眼泪和拳头交相辉映：“四川，挺住！”“中国，挺住！”“中国一定会强大！”差不多十年没见过这样大规模的爱国热情的自发表现了。置身这些口号、标语和旗帜之海，大概谁都觉得，人心不会再冷下去，历史应该翻开新的一页了？

不难看出这情形的正面意义。它至少说明，无论中国人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如何受挫，也无论“市场经济改革”如何软硬兼施，诱迫人们聚焦于个人的物质生活，更无论媒体如何教导人们远离“崇高”，到“消费”中去体会“人生”、“成功”的意义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，依然需要认同某种（些）精神的价值，某种（些）个人物质生活之外的更大的事物。至少现在，中国人还不是一个甘当“经济动物”的民族。

不过，和社会各阶层普遍同情灾民不一样，到目前为止，只有部分民众明显表现出对“中国”及其“强大”的认同。这也正常。通讯再发达的社会，总是只有一部分人有条件表达自己，其他人——往往是多数——默不做声。当电视、主流报刊和网络让你觉得，是那些经济发达地区——尤其大中城市里——的、19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、属于中等收入阶层或还在大学读书的、多半没有直接受灾或目睹灾况的人，充当了这一波爱国热潮的主体人群，我们一定得记住，大多数人还没有说话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想。

这些沉默者当中，一定有许多人不赞同、甚至并不在意这一波爱国热潮吧，尽管他们亲近自己生活的这一片土地，且根据不同的定义，都觉得自己是爱国者。但我相信，媒体呈现的这个高呼“中国”的主体人群，并非全是虚幻，即便在那无声的大多数人中间，它

也有若干代表性。

如果这两个假定大体不错，那我就有一连串问题，要在这里提出来：

首先，这个主体人群认同的是什么“中国”？

前面说过，现代中国革命的政治结果之一，就是形成了与譬如现代西方明显不同的政府/国家/社会状态，不但政府和国家很难分开，社会也和它们深度结合。与此相应，现代汉语对这些政治概念的命名和使用，也是笼而统之，譬如英文的 *country* 和 *state*，差别甚大，我们却都称为“国家”，甚至 *government*，政府，也常常自称“国家”，以致一般人在表达——亦在认识——上，并不习惯区分不同涵义的“国家”，甚至不习惯区分“政府”与“国家”。

正是这种现实的混杂和命名的笼统，给了“国家”一个充当顶级价值名目的可能。至少这大半年里，它就表现了极大的聚合力，将“民族”、“中华文明”、“现代化”、“全球化”等等，都含糊地吸收为自己的一部分。它俨然成了许多中国人公共认同的首要对象，其他风云一时的概念：“人类”、“世界”、“个人”、“人民”、“社会主义”、“阶级”……好像都无力与之抗衡了。

但也正是这样的现实和命名，让我们实际上对“国家”又很困惑。一个对政府和基本制度有较大反感的人，很容易冷淡国家和社会，觉得这些和自己没什么关系。我们看看四周就知道，这样的人真是不少。也有许多人不想走得这么远，他们依然愿意—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——爱这个国家，但其所爱之“国”，通常偏于抽象：“中华文明”啦、“吾土吾民”啦，似乎只有避开具体存在的政府和政治制度，他们才能安心爱国。另外还有一些人，是主要到与别国的交涉——包括现代史上对这交涉的屈辱记忆——中，去体会“国家”的意

义的：护照、关税、领土、能源短缺、南京大屠杀.....但是，这样的体会往往需要一段与国内实际政治生活的距离作为保障，一旦这个距离缩短、消失了，就很容易被冲散。单靠“鸦片战争”和“南京大屠杀”那样的历史知识，很难长久维持一个人的爱国之心。

一群人坐在一起，每个都说自己是爱国者，可你仔细问一遍，大家所爱之“国”，十之八九都不一样：这样的情形，见得还少吗？

中国的现代之路，走得和许多别国都不一样，中国人对“国家”的体认，一定和许多别国人不同。这一波爱国热潮的主体人群，所爱的究竟是什么？应该不再是上面所列的几种了吧？那是什么呢？是由制度、疆域、人口及其符号系统构成的现实的“国家”？是中央政府所握执的日益壮大的“国力”？或者比上列的几种更模糊，只是一个与政治/语言现实一样笼而统之、难以明确的情感的“中国”？

其次，这个主体人群是经由何种精神或物质途径，体会到“中国”之值得认同的？

我首先想到这一些途径：这一次中央政府全力救灾，充分显示了“国家”的实力和重要；身为人口和疆域大国的知识国民，却在最近三十年深切感受到与西方相比的“落后”的自卑，再加上悠久文明的历史记忆，自然激聚成对中国之强大的由衷渴望；最近二十年GDP持续增长，中等收入阶层的物质生活明显改善，可以买公寓、买汽车、出国旅游、到第五大道和 *Lafayette* 百货公司去购物，北京、上海与伦敦、东京的“硬件”差距，更是快速缩小：这些似乎都确证了中国的“崛起”，令人很容易对陪伴——乃至主导——这一切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好感.....

当然还有别的途径；就是上列的这一些，也都需要进一步的研

究来核实。但我们不妨就沿着这些途径所凸显的方向，继续提问。

#### 4

今日中国各种思想的一个交锋点，是如何评价最近 25 年——特别是 1992 年以来——的“改革”。这一波爱国热潮是从怎样的角度加入这个交锋的？从我上面列出的那些途径来看，它的至少一个重要来源，是其主体人群对经济持续发展、消费水平逐渐提高、国家诸种硬实力明显壮大等物质状况的切身体会。这是不是意味着，这个人群所代表的对于“中国”的新认同，正内含了一种对于“改革”的总体的肯定？

自 1990 年代中期开始，一种与“毛泽东思想”明显不同的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日渐成形。作为 1992 年再次发力的“市场经济改革”的孪生兄弟，它很自然地充当了这场“改革”的首席宣讲师，我也因此暂名其曰“改革主义”。倘说这一波爱国热潮在事实上增强了肯定“改革”的声浪，那它和“改革主义”是什么关系？是提供了对“改革”的另一种认识，虽然也是正面的，但角度不同，因而形成了对“改革主义”的某种突破？或者相反，它正是“改革主义”的衍生物，标志着其国际面向的初步成形？用“改革主义”的一个流行符号来说，21 世纪的“成功人士”不但依旧满口英文，而且开始鼓噪“大国”的“崛起”了。和对“美国模式”的崇拜相比，也许这样的鼓噪声，才更能表现“成功人士”的成熟的政治意识和全球关怀，令它的形象趋于完整？

人们常说，1989 年之后的政治和经济状况，迫使中国人主要从“个人”和“物质”——而非也从“社会”和“精神”——的角度去确定自己的生活意义。最近二十年的社会现实，基本上是印证了这个说法的。那么，这一波爱国热潮是否改变了这个现实？如果有改变，程度如何呢？从民众对一己之私的相当普遍的超越，可以说它确实促

成了那个被“个人”角度遮蔽的“社会”——或“公共”——角度的部分的重现；我们能不能说，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那个被“物质”角度扭曲了的“精神”角度的重现呢？

倘若回答是肯定的，那是什么样的精神的角度呢？是前面谈到过的那种对抽象“逆境”的体认么？当人们将“地震”和“西方”归为一类，高呼“四川”和“中国”一同“挺住”的时候，你确实能感受到这种体认在沸腾：对灾难的震惊、对“西方”的失望、屈辱的历史记忆、现实生活的压抑感、不甘心“就这么算了”的冲动、怎么也难灭绝的好胜和自尊心……一旦某个突发事件将所有这些吸聚到一起，形成一个“陷身逆境、自强不息”的想象的位置，许多还对人生和世界抱有希望的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就很容易被它吸引，要站进其中，领受鼓舞。晚清以来，这样的情景一再发生。我甚至觉得，在今天，这样的搭建在逆境之自觉上面的精神位置，可能比“传统文化”或“黄皮肤黑眼睛”更有感召力，更能将实际分立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联系在一起，令其觉得“都是中国人”。

倘若回答是否定的，那又是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一波爱国热潮，至少是其若干关键的构成因素，例如前面谈到的那个主体人群体认“中国”之可爱的途径，依然表现出深刻的唯经济——甚至是唯物质——倾向，因此并没有脱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“消费”的如来之手？就像公寓和汽车有力地塑造了我们对于“个人”的体认一样，薪水、中央商务区、出国旅游的机票等等，也开始有力地牵引我们对“国家”的体认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一波的爱国热潮，是否正从一个方面，诡异地体现了“消费=人生”这一全球性价值确立模式的巨大的扩散力？

这一波爱国热潮的主体人群，基本是由接受了系统学校教育的

年轻人构成的。1990年代中期以后，学校教育倾斜得越来越厉害，应试教育模式实际上覆盖了整个中小学阶段，大学教育日渐偏往轻文理、重应用、薪酬导向的轨道，历史和文化教育的空白点，更是有增无减……照一般的理解，这样教育出来的人，多半脑子比较简单、机械，不关心社会，只在乎个人的物质生活和成功。可是，这一次分明有许多平常似乎正是如此的年轻人，积极投身救灾热潮，为“中国”呐喊和落泪。这该如何理解？今天这样的学校教育，究竟在中等收入的年轻一代及其候补人群身上打下了怎样的烙印？它是如何作用于他们的社会/精神视野、政治态度和思维能力的？又是如何与同样作用于他们这些方面的其他社会“教育”——例如传媒和职场教育——互相呼应或冲突？一个大学毕业的白领，TimeOut的订户，对街头乞讨的老妇看都不看一眼，每日孜孜于赚取偿还按揭之款，这一次却对着电视机里的国旗泫然泪下，还冲动地报名去北川当志愿者——尽管后来没去成：如果你和他面对面，你怎么理解他？是觉得他内心分裂？还是觉得很正常，种种看似矛盾的心理和行为底下，其实有更深的相通，而这相通的奠基者之一，正是他从7岁开始接受的16年的学校教育。

5月19日天安门广场上群情激奋的年轻人，似乎再一次证实了：第三世界人民的社会或集体认同，通常是从对第一世界的抵抗中获得动力。自晚清以来，几乎所有政治人物、军人和文化人，只要谈到“新中国”——无论那是什么颜色的，都认定它应该“强大”，似乎不“崛起”，就没有中国之“新”。而这“强大”或“崛起”的具体内容，则每每因时而异，有时候说得相当清晰，有时候一团模糊，只是一句口号。那么，这一波爱国热潮祭出的“强大”二字，是怎样的涵义呢？是世界首富？军威最盛？或者民权发达？精神文化阔步全球？

还是又和以前多次出现的那样，并无清晰内涵，只是一团模糊？

目前来看，答案好像是后者，大半年来，政治人物和文化人，更不要说那些激动的年轻人了，对国家未来的描绘，线条依然极粗。这也自然。如今整个世界，大凡有点头脑的，都对人类的未来深感迷惘。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，好像都断了，资本主义自己的毛病，却越来越重，各种现成的政治和社会理论，又都给不出足够的光亮，在现实的黑暗中四面摸索，就成了大家共同的命运。我们当然也不例外。

这是一般而言，中国更有特殊之处。今日中国大地上，支配性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实践，已经远远超出现有理论能够照亮的范围，也明显偏离了西方主流现实指示的方向，因此，无论今后实际的国家形态，还是人民对这国家的体认，也无论从一般的立场来看，它们是令人欣慰，还是引人担忧，都势必与二十世纪见惯的不同，是新的面目，也是新的路径，更是新的紧张。在没有路标的荒地上走，再顺当也快不了，何况一定常常迷路，进一步绕两步的，更加费时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一波爱国热潮在国家认同上的空洞和模糊，正是不可避免的吧。甚至还可以因此乐观：它们是不是也为新的社会思想和实践，腾出了不断填充“国家”认同的宽大的空间？

社会气氛明显转变的时候，知识分子总是特别敏感。中央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救灾，引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激赏，他们由此反省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的言行传统，例如总是从批判的立场看待现实，觉得民众容易受蒙蔽，等等。倘说整个 1990 年代，知识界区分“翼”别的主要界限，是看你尊崇“个人”自由，还是强调“阶级”——或者温和一点，“阶层”——冲突，现在却有第三个基点浮升上来：“国家”的“崛起”。尽管这“国家”的涵义，似乎众说纷纭，其中有一个



倾向，却相当清晰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，现实的“国家利益”，应该成为权衡取舍的主要标杆。无论三、四十岁，还是五、六十岁，也无论以前常被人目为何种“主义”，似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开始谈论“国家”，在那新一波爱国热潮的汹涌中，不乏知识分子的弄潮身影。

总体来看，这自然是表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历史敏感。从康有为的时代起，中国人就一直盼望自己的国家“站起来”。政治人物多次宣布已经“站起来了”，但人民最后却每每失望，因为发现还是站得远不够挺直。但是，这一次似乎不同，一百五十年来，中国第一次在 GDP 的绝对数值上持续飙升，接近世界的前几位，以至西方都有人预测，五十年后中国在经济上世界第一。正是这个新的情况，让许多人相信，中国这一次真是临近了“大国崛起”的历史转折点，知识分子必须拿出新的思路，展开更为积极的行动。

但也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因，要分开来讲。

近年来，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膨胀，现实愈益严峻，另一方面是知识界和整个社会情绪的低落，萎靡不振，这两方面的汇合，激起人——特别是年轻人——的强烈不满，他们迫切地想抓住某种坚实可靠的东西，自我激励。而无论“国家”还是“人民”，此时都比那些福柯式的、每每致人无处立足的激进理论实用得多，他们当然要转向它了。1990 年代以来，中国大学校园内外，福柯、德里达等等领头的西方批判理论，一直影响巨大。但今天，如果知识分子的这一堪称激烈的转变持续蔓延，西方批判理论还能保持这样的影响力吗？更重要的是，转变中的知识分子，如何处理已经堆积在自己思想中的那些激进的理论片段？

由于严格的信息管制，今天三十岁以下的人，普遍不了解 1989

年的巨大风波，今天四十岁以下的人，普遍不了解“文革”和 1950 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和社会状况。这些历史记忆的欠缺，显然也影响了许多人对“国家”的现实形态的判断。

近代以来，中国知识界一直是在全球视野中把握中国问题的，尽管从不同的眼睛看过去，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。今日世界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独大。你越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，越是关注如何制衡美国之独大，就越会觉得，中国必须强大，中国的发展，应该以“强大”为首要目标。而越是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，你可能又会觉得，别无选择，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。只有一个强有力、同时比较开明的中央政府，才能遏制吏治之腐败、保持社会之稳定、国家之统一，进而达致中国之强大……在这样的思路中，现实行动的可能性似乎成了思考的第一要义，对世界大局的关注，也很容易令人忽略中国社会内部那些不能被“强大”代表的问题。

有意思的是，正是对中国在中美或中西方关系中被压抑的弱者位置的充分自觉，导致了应该在自己国内尊崇强者——“国家”——的思路。在国际上是这样，到了国内却那样，二者的种种不一致，是否正体现了现代中国的左翼思想和革命实践的某种悖论式的宿命？

……

一连串问题。至少此刻还难有完整的答案。但我因此明白了：潮水势将退去，地形却已经改变。当人民的救灾热忱和爱国激情逐渐消散的时候，它们冲开的那些社会和人心的空间，它们对新的思想、精神和行动的召唤，却继续存在。

## 5

可以很快地列出一系列川陕甘地震后的新气象：

中央和灾区各级政府顺应民意而打开的若干空间，特别是“志愿者”的大规模行动模式及空间；

在各界踊跃救灾中凸显的“人民”、“80年代生人”等等的正面形象，它们能部分地消除积久形成的普遍的沮丧和放弃感；

全民救灾和爱国热潮所显示的人民内在的公共认同的需求，将近20年里，它是第一次以如此规模释放出来；

民众因非常局势形成的对官僚腐败等等不愿麻木对待、奋起斗争的热忱，这开始主要是表现在灾区，但也在向其他地方扩展；

民众实际救灾获得的在现实条件下开展公共行动的经验，其中当然不只有积极的部分，但就是其消极部分，亦有相当的正面意义；

地震及其前后事件所提供的新的观察点和分析角度，知识界如能及时抓住这些新的思考条件，当可对现实做出有力的分析……

但是，另一面的情况也不容小觑：

就灾区而言，一旦渡过最初的失序状态，新的政府管制体系重建起来，在救灾过程中开放的各种空间，有可能被缩小以至关闭；

如果灾后重建的巨额投资，依然由地方政府一手分配，如果住房和生计被严重毁坏的当地民众，不得不比灾前更依赖政府，新的贪污腐败就很容易滋生，而且比灾前更少阻碍……

事实上，现实社会的各种负面状况，若干政府和国家机器的积久形成的运作惯性，正在以各种方式，将激动起来的社会——不止是灾区——拽回过去的萎靡状态。要想保持和扩展上列的各种新气象，顺势推进社会的良性改造，并非易事。

在这两面混杂的情形中，像我这样的学院知识分子，能做什么？

可以努力了解和传播多样的灾况和救灾信息，揭发那些总是有人想要捂住的人祸，持续追究其制造者的责任。

可以持续关注救灾和重建的资金问题，从“如何使用 400 多亿社会募捐”，到“如何使用所有公共资金”，从增加各级财政预算的透明和公平度，到建立一套可有效监督的公共资金分配制度，将因非常状态而起的对于各类制度建设的关注，扩展为对平时的更大范围的同类现象的干预。

可以用言论支持和亲身参与等等方式，扩大在救灾中打开的民主参与的实践空间。这样的空间并不意味着与国家机器的必然对立，恰恰相反，就实情而言，它几乎必然要与那机器的运作结成多样的非对抗的关系，这也常常正是它得以成形的前提条件。不过，我还是要说：这样的空间应该逐步扩大它的“民间”意味，而不是最后被收编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。如果那样了，无论对社会、国家还是政府，都不是好事情。

更可以瞪大眼睛，密切关注灾后重建的整个进程，警惕一部分官僚和国内外资产阶级联手攫利，加重灾民、中央政府和各地捐助者的负担。如果各方努力，因抗灾而激发的勃勃民气，能够转化为持续参与和监督重建事宜的正面力量，那就有可能将灾后重建发展为某种良性建设的“试验”项目，为整个社会的全面改善提供经验和教训。

当然，和以上四件事相比，我们更该做、也可能做得较好的，是第五件事：发展新的公共认同，推动社会形成促其良性改变的精神依据。

一个现代社会，要想长治久安，就不能只靠各阶层之间——以及其内——的利益平衡。它必须建立公共的价值认同，来充当自己

的精神依据。倘说在今天，“如何看待‘国家’”，已经成了一张反映今日中国人公共认同之普遍状况的最有效的测纸，甚至在一定范围内，“国家”已经成了公共认同的一个新焦点，知识分子建设良性公共认同的首选的着力点，就应该也是“国家”。

即便“社会主义”时期和“改革”的前二十年，常常有别的流行词汇盖住了“国家”，中国人也一直是爱国的。正因此，从前面的描述可以看出——如果其中的那些假定和估计能被证实，这一波爱国热潮确实显示了中国人认同“国家”的若干新形式：对个人物质生活的“正面”体验，对中央政府的行政、资金和军事力量的“正面”感受……并不是说人民过去就没有这类体验和感受，但至少最近 30 年里，这类体验和感受好像是第一次这么普遍而强烈地表现出来。

这些年，不断有雄辩者告诉我们，全球化时代了，“国家”不重要了。像我这样读着鲁迅长大、后来又读过一些马克思的人，也不会真觉得“国家”有多么神圣。但是，我看重这一次全民救灾，也看重这一波爱国热潮，因为它们表现了人民公共认同的深厚潜能，如今的中国，是太需要这潜能的勃发了。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弄得獐头鼠目、四分五裂，现在是太需要舒展身心，抖擞精神，堂堂正正做一回中国人了！

但唯其如此，中国人的公共认同，就不能只是被一个“国家”圈住；我们对于“国家”的热爱，也不能都——甚至不能主要——依靠对个人收入和物质国力的自得。这些都是不稳定的，也多半不持久的，一段时间的经济停滞，到处可能发生的负面的政治感受，会极大地破坏它们，进而挫败那宝贵的、正借它们以显形的社会——不只是心理——能量。

所以，知识分子应该更大声地、也更多样、更辩证地来讨论“国

家”。不只是赞叹那些新的爱国体验和感受，更是接着它们往下讲，往前讲，扩展和丰富它们，创造人民公共认同的更宽阔的前景：

——勾勒人的生活世界的完整轮廓，特别是描述那些被日常物质消费所遮蔽的生活内容：人们越是发现自己意识到的生活经验是片面的，就越不会满足于经济发展之类的单项目标，而会转而要求人的生活全面改善；

——进一步扩展人们对“现实”的理解，深入分析个人、社会、国家、地方、阶层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：人们一旦认识到“政府独大的政治状况”与“实际社会生活的多样关系和潜在能量”之间的深刻矛盾，就不会再让“政府/国家”挡住自己的全部视野，而随着对别的那些至少和“国家”同样重要的社会层面的体察不断深入，人们对“现实”的范围的理解，势必大大拓展；

——深入描述 150 年来中国被动现代化的曲折历史，特别是描述“国家”、“民族”、“社会主义”等等在此段历史中形成和变迁的丰富过程，打破现行教育和传媒体制对这一段历史之论述的深刻限制：正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了解，能让国人在现实刺激面前保持清醒，在深切体验的同时，不丧失鸟瞰式的判断能力；

——深化国人对国际和全球问题的理解，特别是强调中国对于全球应负的历史责任：只有充分意识到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严重倾斜和难以为继，同时意识到中国对于探寻合乎道义的全球秩序能起的作用，人们才不会只是一门心思要与现行“世界”“接轨”，也不会两眼只盯住国际竞争、将道义丢诸脑后，而愿意发展真正有气度、负责任的大国之国民/政府的精神和风度；

——展开对于“我们所希望的国家”的充分讨论，由此展开国家认同的“未来”面向，事实上，这个面向正是被动现代化的社会在国

家认同上与英国那样的先发现代化社会的最大区别所在；如果这个面向能充分展开，就可以破解今日的基本政治现实——政府、国家和社会混成一团——给国人造成的困惑，避免“国家”成为权贵阶级的令旗，将其转化成推动政府和社会良性变革的一项重要的重要的正面依据。

.....

一句话，要努力拓宽“国家”和国家认同的涵义。这也就是从一个关键的方面，拓宽中国人的公共认同的涵义。

无论是一个冷酷的、差不多完全被逐利逻辑支配的政府，还是一个短视的、缺乏政治头脑的资产阶级，它们都会竭力缩小“国家”和国家认同的涵义，抹杀人民公共认同的需要。知识分子要做的正是相反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只有当“国家”成为一种包含了多样侧面的指向未来的价值目标，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入远远比“国家”广阔得多的世界，我们对它的热爱才能经得起打击，我们也才不至于动不动就跌回冷漠和空虚。

2008年8月上海